

# 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历史回顾及影响因素分析

——纪念中国与以色列建交 30 周年

刘中民 王利莘

[内容摘要] 中国与以色列在很长时期内都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其原因在于两国的双边关系在冷战时期深受国际体系、中东地区格局及彼此外交政策的影响。建交后的中以关系经历了磨合期、稳步发展期和高速发展期三个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于 2017 年建立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其内容突出体现为共建创新合作平台,以创新引领科技、农业、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合作。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长期友好的历史、双方政府的重视、雄厚的经贸基础以及不断增强的抗压能力等,共同构成了中以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而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中东地区矛盾、双方的政策分歧和认知差异,则构成了中以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但中以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未来双方的合作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键词] 中国 以色列 外交关系 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王利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引言

2022 年是中国与以色列建交 30 周年。从 1956 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到 1992 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中国用 30 多年的时间同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以色列是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中东国家。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两个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时间也处在同一时期。但受到冷战体制(特别

是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关系)、阿以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建立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以及中国与以色列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双方最终于1992年1月24日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十分迅速,成就显著。

2017年3月21日,中国与以色列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各类外交伙伴关系中唯一以“创新”命名的伙伴关系,体现了中以关系在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中的特殊性。因此在中以关系进入而立之年之际,对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进行历史回顾,并通过分析中以关系的影响因素来展望其发展前景,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对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始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尚十分有限,只有少数几篇论文,且研究内容多与中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有关。<sup>①</sup>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以关系的发展,相关研究逐渐增加。其中既有对中以关系的综合研究;<sup>②</sup>也有对特定领域如人文、农业、科技交流的研究。<sup>③</sup>“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以色列的“一带一路”合作成为研究重点。<sup>④</sup>此外,国内关于以色列国情和历史研究的著作也都会涉及中以关系。陈双庆所著的《以色列》<sup>⑤</sup>和肖宪所著《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sup>⑥</sup>均有专门介绍中以关系的章节。

国外对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关注也始于中以建交。相关研究可分为三类。

① 参见丁诗传《中以关系和中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12期,第33~39页;李湖《中以关系:历史与现状》,《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4期,第57~62页;陆西亚《中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5期,第20~22页。

② 参见潘光《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第156~163页;殷罡《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六十年述评》,《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第31~35页;崔守军、梁书帆《中以关系的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第56~62页。

③ 田艺琼、阿依·古特菲尔德《新中国对以色列的人文外交》,《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5期,第45~54页;章波《中国和以色列的水技术合作》,《中东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8~159页。

④ 肖宪《“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91~108页;郭白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以色列的人文交流》,《新丝路学刊》2018年第4期,第24~37页;陈广猛、于忠西:《“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以色列经贸合作案例研究》,《新丝路学刊》2019年第4期,第26~51页。

⑤ 陈双庆《以色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⑥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其一,对中以双边关系的研究,例如对中以关系的历史回顾、<sup>①</sup>兰德公司发布的关于中以关系的研究报告,<sup>②</sup>以及对中以军事关系和中以经贸关系的研究等。<sup>③</sup>其二,对中国—美国—以色列三边关系中的中以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研究中以关系必须考虑以色列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只有从中国—美国—以色列三边关系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认清中美博弈对中以关系的挑战。<sup>④</sup>还有学者强调以中美关系为核心考察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并把台湾问题视为影响中以关系的因素之一。<sup>⑤</sup>其三,地区研究中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研究。例如把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置于中国中东外交框架内进行研究;<sup>⑥</sup>分析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sup>⑦</sup>

可以看到,伴随中以关系的发展,中以关系研究也不断升温。就国内外研究的对比而言,国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优于国内。但这些以西方和以色列学者为主的研究多从中国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中美博弈等角度认识和评价中以关系。尤其美国和其他西方学者的研究多把中以关系的发展视为对美国和西方的威胁。因此,在中国与以色列建交30周年之际,在充分评估中以关系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中以关系的历史、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总结和评估中以关系取得的历史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进而推动中以关系更加稳健和成熟地发展。

---

① Yitzhak Shichor, "Hide and Seek: Sino-Israeli Relations in Perspective," *Israel Affairs*, Vol. 1, No. 2, 1994, pp. 188 ~ 208.

② Shira Efron, eds., *The Evolving Israel-China Relationship*,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9; Shira Efron, eds., *Chinese Investment in Israeli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20.

③ P. R. Kumaraswamy, "The Star and the Dragon: An Overview of Israel-PRC Military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0, No. 4, 1994, pp. 42 ~ 43; Yoram Evr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hina-Israel Relation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Roles and Limitations," *Israel Affairs*, Vol. 23, No. 5, 2017, pp. 828 ~ 847.

④ Yoram Evron, "Israel'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A Dependent State's Dilemma," *Asian Survey*, Vol. 56, No. 2, 2016, pp. 392 ~ 414.

⑤ Jonathan Goldstein, "A Quadrilateral Relationship: Israel, China, China's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92,"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2, No. 2, 2005, pp. 177 ~ 202.

⑥ Erzsébet N. Rózsa, "Deciphering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 of Security Studies, <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deciphering-china-middle-east>.

⑦ Mordechai Chaziza,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ic Partnership*, Sussex: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20.

## 二、中以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

### (一) 从相互隔绝到广泛接触: 建交前的中以关系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形成,分属不同阵营的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短暂且频繁的官方接触也受到各自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使两国未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国在中东地区采取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在阿以冲突中选择支持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则与美国共同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共产主义。以色列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不断加深,成为其在中东的重要盟友,进而形成了美以特殊关系。在此背景下,充当美国附庸、不断发动战争、侵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领土的以色列,成为当时中国强烈反对和谴责的对象。

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具备建交的条件。但中以非政府间往来并未完全断绝。双方的民间往来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官方人员的非正式接触,包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与以色列驻罗马尼亚公使阿里耶·哈雷尔的私人会面、<sup>①</sup>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与周恩来总理的信件往来等;<sup>②</sup>其二,在华犹太人与以色列及国际犹太组织的联系,中国政府善待外籍犹太人并支持其自愿离境的做法,在犹太人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sup>③</sup>其三,两国共产党之间保持了长期的友好交流。此外,中以非官方商贸活动也从未中断。<sup>④</sup>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在中美关系缓和、中东地区形势变化、中东和

<sup>①</sup> 余纲正《以色列与中国建交的历史考察——基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涉华解密文件的解读》,《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第111页。

<sup>②</sup>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案号3426/16-17,《周恩来与艾希科尔信件往来》。转引自殷罡《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六十年述评》,《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第34页。

<sup>③</sup> 殷罡《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六十年述评》,《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第34页;潘光《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第158页。

<sup>④</sup> 阿龙·沙伊《中以关系历史回顾》,《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第68页。

平进程启动的背景下,中国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的条件日益成熟。中美关系缓和带动了一大批西方国家和亲西方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建交。受此影响,中国也迎来了第三次同中东地区国家建交的高潮,海湾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等亲西方国家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建交。与此同时,中东形势和阿以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和解并建交,巴勒斯坦在继续武装斗争的同时谋求政治解决巴以冲突,1988年巴勒斯坦宣布建国后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这一切都使阿以和巴以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国际形势和中东地区形势变化使中国初步具备了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同时发展关系的条件。在1988年到1990年的短短两年内,中国与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沙特等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最终同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建交。1989年,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访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提出了中方关于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这些主张既强调了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益和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也强调了以色列的安全应得到保证。<sup>①</sup>

1991年召开的马德里会议使巴以双方实现了直接谈判,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的重大进展。中国积极支持以马德里会议开启的中东和平进程,并积极推动这一进程。这些政策表明中国针对巴以、阿以关系变化进行了积极政策调整,既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坚定维护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的正当权益,也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及其安全需求,同时大力支持政治解决中东问题。这为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创造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后,中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接触日益频繁,这为双方正式建交做好了准备工作。在政治上,在中英《联合声明》确认香港将回归后,以色列于1986年重开驻香港领事馆,成为其对华联络的重要窗口。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以双方高层接触频率大幅提升。1987年3月和9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在纽约两次会见以色列外交部官员;<sup>②</sup>9月,时任以色列外长西蒙·佩雷斯与中国外长吴学谦在联合国会面。1990年,中国国际旅行社设立

① 鞠殿明《中国对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思想政治课教学》1989年第12期,第36页。

② 潘光《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第159页。

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同时以色列官方学术机构科学与人文学院在北京开设联络处,两处机构享有实质上的外交权利。<sup>①</sup>在经济上,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中以贸易活动日趋增加。在文化上,中国自1982年起允许以色列学者以个人身份来华交流。

总之,伴随国际形势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与以色列自身外交政策的调整,加上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往来的日趋频繁,中以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

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终于正式建交。这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与中东国家的全面建交,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中东事务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创造了条件。

## (二) 建交后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过程及成就

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的结束使美国确立了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美国极力打造以以色列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盟友体系,在隔离墙与定居点修建、巴勒斯坦难民等问题上偏袒以色列,并在安理会不断为其动用否决权。另一方面,美国主导了中东和平进程,积极推动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通过产油国施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和谈。<sup>②</sup>

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主义行径,特别是对以色列的偏袒,导致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情绪高涨,最终导致了“9·11”事件的爆发。此后,美国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争”,试图用政权更迭和民主输出等方式对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造。在此过程中,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投入不断减少,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而以色列采取的强硬政策,特别是对加沙地区采取的数次军事行动,也再次使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状态。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中东和平进程进一步被边缘化。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公然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使巴以和平的希望更加渺茫,并多次爆发

① 潘光《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第159页。

② 田文林《国际权力体系的三大类型变迁及对中东的影响》,《国别和区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49页。

冲突。

对此,中国始终既坚定支持和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反对以色列的激进政策,又支持巴以和谈,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多次提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张。同时通过高层互访和2002年设立的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进行劝和促谈和外交斡旋。

建交后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虽有波折,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美国始终是制约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发展的最大消极因素。建交以来的中以关系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 1. 磨合期:1992~2005年

从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中以关系虽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欣欣向荣,但由于受到美国的干扰,中以国防技术合作被迫中止。

中以建交后,两国政府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1993~1994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合作协定,涉及旅游、文化、科技、邮电、税务(避免双重征税)等各领域,<sup>①</sup>在贸易、农业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就。

第一,中以经贸合作迅速发展。1992年10月,两国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sup>②</sup>据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统计,从1992至2006年,中以双边贸易进出口额逐年攀升,从5147万美元增至38.7576亿美元,翻了60多倍,即使在2000年和2005年中以关系遭遇挫折时,贸易额也未出现下跌。<sup>③</sup>

第二,农业成为两国长期合作领域。自1993年北京市通州区设立中以示范农场以来,两国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双方还合作在山东、云南、甘肃、内蒙古等多地建立了农业科技示范合作基地,设立了“中以农业科研基金”。中以两国的农

---

①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邮电领域合作协定》(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旅游合作协定》(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1995年)等。

② 潘光《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第160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1992~2006年中以两国贸易数据》,http://il.mofcom.gov.cn/article/zxhz/tjsj/200702/20070204410836.shtml。

业部也多次进行互访,推动农业企业合作的对接。

第三,文化教育交流频繁。2000年,中以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教育合作协议,此后又签订了2002至2005年的文化合作执行计划。双方还多次举办“文化年”等交流活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孔子学院;双方留学生数量不断提高,书籍译介工作积极展开。<sup>①</sup>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双方的文化教育交流。

但是,以色列依附于美国的美以特殊关系和中美关系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中以关系势必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以色列无法摆脱美国控制,这使其在关键时刻不得不以牺牲中以关系来维护美以特殊关系。

冷战结束后,尽管广泛经贸和文化交流合作使中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但美国仍坚持冷战思维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导致中美关系曲折多变。中国与以色列关系也经常受到美国的干扰,甚至被迫中止,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国防领域的合作。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单方面违约,曾导致中以两国的防务技术合作在1996年和2005年两度中止。

## 2. 稳步发展期:2005~2011年

这一时期,中以关系虽因美国干扰受到一定影响,但双方的经济合作潜力很快使中以关系得以重启。200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时任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率团访以,签署了包括《加强经贸合作备忘录》在内的多个合作协议。以色列承认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使中以关系在经贸合作的带动下很快转暖。

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阿合作论坛”(2004年成立)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与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大国的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在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作用不断上升,并积极履行维和和反海盗等国际责任。中国在中东事务中作用的增强和话语权的提升使以色列对中国更加重视,进而加速了双方的合作。

2007年,为庆祝建交15周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访华,中国

---

<sup>①</sup> Aron Shai, "Sino-Israeli Relations: Current Reality and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5, No. 2, 2011, p. 31.



多位高层领导人也陆续访问以色列。2010年,中以签订《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强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sup>①</sup>同年5月,两国还签署了《关于促进产业研究与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从2005年开始,中以高级官员相互访问频次和人数明显增加。<sup>②</sup>这些都直接推动了中以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发展。

### 3. 高速发展期:2011年以来

以2011年两国高层军事访问恢复为标志,中以关系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并于2017年正式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2011年,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访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将军访以,标志着两国正式恢复了中断近十年的国防交流。2012年,以色列宣布在中国开设第四个领事馆,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以色列开设领事馆数量第二多的国家。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访华;同年12月和次年5月,中国外交部长和副总理分别访问了以色列。

2017年3月,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明确强调“双方同意继续在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机制下开展创新合作,加强两国在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计划、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创新园区、创新合作中心等民用领域的务实合作,探索一条从研发、转化到产业,从创新到创业的合作新模式,搭建一系列创新创业的合作平台。”<sup>③</sup>

时任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访华期间,用“天作之合”来形容中以关系。<sup>④</sup>除《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的联合声明》外,两国还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1)》。在中东地区,中国同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伊朗、阿联酋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卡塔尔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还与其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法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h/at/201002/20100206778902.html>。

② 潘光《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第160页。

③ 《中以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www.scio.gov.cn/31773/35507/htws35512/Document/1545770/1545770.htm>。

④ Herb Keinon, “US Meddling in ‘Marriage Made in Heaven’—Analysis”,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us-meddling-in-marriage-made-in-heaven-analysis-629361>。

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以色列则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唯一以“创新”为主题建立的“全面伙伴关系”国家。“创新”也是中以“全面伙伴关系”的核心内涵。

根据 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该报告所涉及的全球 132 个经济体中,中国香港在新兴产业、高科技进口和全球品牌价值等指标上紧随美国之后位居第二,中国(大陆)在高科技出口和研究人员等指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以色列则在研发支出和监管质量方面名列前茅。<sup>①</sup>

中以两国在创新领域的合作产生了丰富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共建创新合作平台。自 2015 年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成立后,创新平台数量逐年增加。截至 2019 年底在建或运行的共计 46 个。双方合作成立了包括常州创新园、上海创新园、内乡高效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示范园、广州生物产业孵化基地、北京—特拉维夫创新中心、云南中以创新中心等多个合作平台。<sup>②</sup>

第二,中以科研合作强度不断增长。两国合作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总体都有提高,其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指标(3.49)甚至高于以色列与美国的合作(1.97)。<sup>③</sup>

第三,创新引领农业合作,高科技含量不断提高。2019 年,中以农业科技创新合作(项目“玄武论坛”在南京举办,签约项目包括朗坤物联网有限公司与以色列“Tevatronic”公司合作开发的智能灌溉系统等。2021 年初,“中以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以色列多家公司展示了滴灌节水、虫害防治、光谱检测等方面的尖端技术,两国农业专家在线交流。<sup>④</sup>双方的交流合作不仅涵盖传统的节水、抗旱、育种、防虫等领域,还涉及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两国还在气候问题、荒漠化治理、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等与农业问题密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合作。<sup>⑤</sup>

①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 p. 28. <https://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gii-2021-report>.

② 张倩红主编《以色列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60~366 页。

③ 同上,第 376~385 页。

④ 《青岛以色列“国际客厅”2020 中以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成功举办》, <http://www.qingdao.gov.cn/zwgk/xxgk/gxjs/gkml/gzxx/202101/t20210111-2890958.shtml>。

⑤ 张倩红主编《以色列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2~123 页。

第四,创新提升教育合作。根据2015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以色列外长利伯曼共同签署的《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两国高校间组建了“中以7+7研究型大学联盟”,目前包括清华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共同设立的创新平台“XIN中心”、以色列理工学院与广东汕头大学合作办学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多个合作研究机构和平台。双方高校的校际交往也不断增加。仅2016年5月至2017年6月一年之间,以色列和中国大学领导就进行了约10次交流互访。2016年,首届中国—以色列大学校长论坛在耶路撒冷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并发表演讲。此外,以色列境内现开设有2所孔子学院,在中东地区仅次于土耳其,与阿联酋和约旦数量相当。

第五,民间创新合作方兴未艾。《中以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双方明确开展双边民用创新合作的必要性和作用,愿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加强民间创新能力,支持和积极推进两国在公共和私营领域以及公司、投资者、高校和科研机构间的创新合作。”<sup>①</sup>2020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腾讯、奇虎、人人、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积极投资以色列风险投资公司,为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先进领域的科技公司提供资金。包括几位中国创始人的风投基金“MizMaa”<sup>②</sup>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等也活跃在对以色列公司投资前列。<sup>③</sup>中国对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的民间投资相当活跃,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升级和两国先进科学技术非官方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推动了中以关系发展。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色列对此进行了积极响应,并以“东向”政策进行战略对接。以色列时任经济部长在议会发言中使用了“历史性行动”一词来形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位。内塔尼亚胡总理也称亚洲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2013年,

---

① 《中以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www.scio.gov.cn/31773/35507/htws35512/Document/1545770/1545770.htm。

② “MizMaa”为希伯来语“Mizrach”和“Maarav”,即“东方”和“西方”的组合,其创始人来自中美两国。见“MizMaa”官网,https://www.mizmaa.com/about/。

③ Shira Efron, eds., *The Evolving Israel-China Relationship*,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9, pp. 39~66.

以色列成立了部长级的促进对华经济关系委员会加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sup>①</sup> 2014年,中国农业部与以色列农业部签署了合作纪要,将农业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sup>②</sup> 随后在2015年内塔尼亚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2015年,以色列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57个创始成员国之一。同年,两国政府间重要合作渠道“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举行。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承包了多项以色列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14年,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泛地中海分公司中标海法和阿什杜德港口建设项目,中土集团承建了吉隆隧道。2015年,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海法新港码头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权。同年,以色列经济部长伊斯莱利·卡茨访问中国时,与中方签署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有“陆上苏伊士运河”之称的“红海—地中海高铁”合作项目。2020年,中国在以色列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达19.6亿美元,同比增长41.1%;完成营业额14.9亿美元,同比增长26.6%。<sup>③</sup> 中国已成为以色列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近年来,尽管中以关系仍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但中以关系承受美国压力的能力在不断增强。虽然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仍会使中以关系出现曲折,但已很难改变中以合作的基础和大方向。2021年中企承建的海法新港成功开港便是一个经典案例。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访以期间,曾大肆宣扬以色列与中国公司合作会对美以同盟造成安全威胁,美方还多次表达对于海法新港的“关切”,<sup>④</sup>但中以合作并未像20年前那样因此中止。

---

① Yoram Evron, “Israel’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A Dependent State’s Dilemma,” *Asian Survey*, Vol. 56, No. 2, 2016, pp. 400~404.

② 张倩红主编《以色列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91~39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中国—以色列经贸合作简况(2020年)》<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tj/hz/202111/20211103221356.shtml>。

④ Shira Efron, eds., *The Evolving Israel-China Relationship*,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9, p. 124.

### 三、影响中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中以两国关系的发展基于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重要原则。30年来,中以关系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巨大合作成就。通过对中以关系进行历史回顾和全面评估可以发现,长期的友好关系历史、双方政府的重视、经贸基础雄厚、抗压能力增强等,是以中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中东地区矛盾、双方的政策分歧和认知差异,则是中以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

#### (一) 影响中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

第一,两国人民有良好的交往基础,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存在直接的冲突。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自宋代开封犹太社团形成起,往来已近千年。二战期间,上海收留了大量受纳粹迫害犹太难民的举动,更成为两个民族患难与共的历史佳话。

在古代中国,国家对进入境内的犹太人予以政治和社会认可并加以管理。宋孝宗曾用“归我华夏”来定位在河南开封定居的犹太人,表达了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对犹太人的接纳。<sup>①</sup>他们对犹太人通常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其保持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sup>②</sup>犹太人同古代中国也早有民间贸易往来。据洛阳希伯来语碑文的记载,“小亚细亚叙利亚一带”的犹太商人早在东汉年间(约为公元二世纪)就已踏足中国。另有不少研究考证了犹太人在古代中国的贸易活动。有犹太人活动足迹记载的城市达十个以上,<sup>③</sup>在中国南北不同地区曾形成过多个犹太社团。在古代,两族的交往既促进了经济贸易往来,也推动了文化交流。

在现代时期,当犹太民族在世界上历尽苦难之际,中国成为他们安全的庇护所。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犹太人保持了良好关系,并接纳了大量犹太移民

① 潘光旦《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76页。

② 李湖《中以关系:历史与现状》,《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4期,第57页。

③ 潘光旦《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77~179页。

和难民。近代共有两波犹太人移居中国的浪潮。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欧洲排犹浪潮影响的犹太人主要迁居到中国东北。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纳粹屠杀迫害的犹太难民进入中国上海等城市。上海曾接纳了超过两万五千名犹太难民,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sup>①</sup>在反犹主义盛行期间,中国两次接收犹太难民的义举,极大增强了中国与犹太民族的友好关系。

从现实情况来看,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的政治矛盾。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争取合法权利,也支持阿以友好相处,<sup>②</sup>承认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权。<sup>③</sup>以色列政府一直未同台湾当局建立官方往来,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第二,两国持续加强政策对接,合作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

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十四五”规划强调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sup>④</sup>以色列是中国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位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时就曾表达以方愿“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等合作”。<sup>⑤</sup>以色列也在政策上“向东看”,积极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以色列丰富的创新技术资源与中国庞大的技术市场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以色列的基建需求也同中国强大的建设能力形成了互补。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口数量有限,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2017年3月,中国商务部与以色列内政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招募中国工人在以色列国特定行业短期工作的协议》。截至2019年末,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务人员已超过7263人。<sup>⑥</sup>

2022年1月24日,王岐山副主席与以色列候任总理兼外长亚伊尔·拉皮德

① 潘光《犹太人避难史上的“中国模式”》,《世界知识》2018年第3期,第67页。

② 丁诗传《中以关系和中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12期,第39页。

③ 肖宪《“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92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http://www.who-wips.com/upfile/202103/2021031444338569.pdf。

⑤ Shira Efron, eds., *The Evolving Israel-China Relationship*,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9, p. 38.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中国—以色列经贸合作简况(2020年)》,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tj/hz/202111/20211103221356.shtml。

共同主持,在线召开的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签署《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22~2024)》。两国以创新合作为基础不断加强政策对接,推进互利共赢。

第三,中以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固。

在体量上,根据商务部2020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中国已经成为以色列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商务部西亚非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与以色列双边贸易额达175.4亿美元,同比增长18.8%;<sup>①</sup>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统计数据同样显示,从2019年底至2021年4月,以色列从中国进口总额月均值总体上涨。<sup>②</sup>

在稳定性方面,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双方经贸合作也经受住了考验,贸易额不降反升。中以自贸区的建设也有利双边关系。中以自贸区谈判自2016年启动至今,已完成了七轮谈判。2021年12月,商务部印发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也提到要推动与以色列等国家的自贸区谈判进程。<sup>③</sup>中以自贸区建设有助于以色列减轻对美国的市场依赖,也有助于增强两国经济联系,降低外部因素影响。2022年4月,以色列央行增持包括人民币在内的4种新币种作为外汇储备,由此降低了对美元和欧元的持有比例。这既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巩固了两国经济联系。

第四,中以关系抗压性明显增强,有利于应对未来风险。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以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合作深受美国的影响而停滞不前,以色列的多次违约体现了美国因素对中以两国关系的制约作用。当前,尽管美国仍是中以关系的重要制约因素,但2015年以色列加入亚投行和2021年中资企业承建的海法新港成功开港等实践,都是中以关系抗压性增强的表现。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中国—以色列经贸合作简况(2020年)》<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tj/hz/202111/20211103221356.shtml>。

② 《以色列从中国进口总额》<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indicator/israel/total-imports-from-china>。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十四五”外贸发展聚焦高质量》<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12/20211203222910.shtml>。

第五,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改善有利于中以关系发展。

2020年以来,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加之此前与以色列建交的埃及(1979)和约旦(1994),以色列已经与近三分之一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色列与未建交的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在持续改善。在巴勒斯坦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尽管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仍受到巴以问题的掣肘,但双方关系的缓和在总体上有利于改善中东地区环境,进而也有利于中国同时开展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合作。

## (二) 影响中以关系的消极因素

第一,美国因素是限制中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本质上说,美国对中以关系的制约一方面来自以色列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使其在外交上缺乏战略自主;另一方面来自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遏制、防范、围堵和打压等政策。因此自建交之日起,中以关系就始终面临美国的压力。由于美以特殊关系对以色列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因而当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被美国视为威胁时,以色列很难彻底摆脱美国的干预,甚至不得不做出违约的选择。

美以特殊关系至今仍是以色列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历任以色列领导人都对此倍加重视,而中国对于以色列的战略优先程度远低于美国。例如,2010年,内塔尼亚胡取消三年来首次访华的安排,转而在美国犹太联合会大会上发表演讲。<sup>①</sup>

因此,尽管建交以来中以关系的主流向好,但由于美国因素的影响,中以关系无论在战略水平和战略高度上都受到了影响。这也使得两国在经济、科技特别是国防领域难以进行高水平的深度合作。

首先,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不断把中国在中东影响力上升视为对其中东霸权的威胁和挑战,由此要求中东,特别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等盟友在中美关系中选边站队,并配合美国向中国施压。

---

<sup>①</sup> Yoram Evron, "Israel'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A Dependent State's Dilemma", *Asian Survey*, Vol. 56, No. 2, 2016, p. 398.



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在能源贸易、基础设施、港口和通信技术方面与中东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在中东获得了地区影响力;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在保护盟友和伙伴、美国基地和驻军安全、稳定能源市场和促进自由贸易等方面挑战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sup>①</sup>因此,美国不断对以色列宣扬“中国威胁论”,将港口建设、中国对以色列投资等经济合作政治化,<sup>②</sup>并利用同盟关系限制中以合作。此外,在新疆、香港等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以及新冠疫情溯源等问题上,美国也不断要求以色列等中东盟国配合美国向中国施压。在2021年,以色列曾投票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入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其次,以色列外交把美国置于绝对战略优先地位。这使中以关系受到制约,甚至发生过以色列为维护美以关系牺牲中以关系的做法。美国对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科技合作特别是国防科技领域的合作横加阻挠的做法,不仅直接阻碍和破坏了中以之间的正常合作,而且是一个导致中以关系曲折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1996年,中国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签订了购买“费尔康”机载预警系统的合同。这遭到美国强烈反对,美方威胁要减少同以色列国防机构的军事技术合作。在美国压力下,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单方面取消了合同,被称为“费尔康”事件。此后,尽管双方在2002年达成了退款和赔偿协议,但中以国防交流陷入停滞,两国关系也一度降温。2005年,美国再次为中国购买以色列“哈比”无人机制造障碍,<sup>③</sup>阻碍以色列履行合同。以色列也因而再次毁约,使中以关系受到严重冲击,被称为“哈比”事件。这两起事件都表明,中以国防合作中止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中以关系的干扰和破坏。

最后,美国通过向以色列兜售“中国威胁论”,为中国和以色列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制造障碍。

---

① Becca Wasser, eds., *Crossroads of Competition: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22, p. ix.

② 邹志强,孙德刚《港口政治化:中国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建设的政治风险探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0期,第80~94页。

③ Yoram Evron, “Israel’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A Dependent State’s Dilemma,” *Asian Survey*, Vol. 56, No. 2, 2016, p. 396; Conal Urquhart, “US Acts Over Israeli Arms Sales to China,”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5/jun/13/usa.israel>.

2008年,中国公司收购以色列最大食品公司“Tnuva”时,以色列一度顶住美国压力未成立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但最终还是屈于美国的压力,于2019年成立了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虽然这一机构到目前为止暂未对中国在以色列投资造成重大阻碍,但仍是以色列对美妥协的一个表现,并为未来以色列在美国影响下加强对中国的投资审查埋下了伏笔。

在海法新港建设过程中,美国也多次宣称中国将利用该港口监视可能会停靠在此的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军舰,进而对美国和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中国参与的以色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多受到美国以安全为借口的施压。此外,2022年初,以色列政府阻止了中国铁建联合一家以色列企业共同投标特拉维夫轻轨“绿线”和“紫线”项目。尽管中国企业已有建设“红线”的成熟经验,但该项目最终由两家欧洲公司中标。由此可见,美国对中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始终抱有高度警惕,持续进行打压。

总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以关系发展受到美国干扰的程度也会随之加大。这需要中以双方把外交原则立场与外交智慧和艺术相结合进行妥善应对,尽力使美国的干扰和破坏不至于伤及中以关系的基础。

第二,中东地区矛盾和巴以矛盾对中以关系的制约。

中以两国在中东地区诸多问题如巴以和平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存在立场分歧。特别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伊核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同中国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原则立场存在较大差异。这对中以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巴以问题上,中国历来支持巴勒斯坦实现民族权利,同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支持巴以双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2021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与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通电话时,强调了要“推动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也表明中方历来主张以巴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和平共处的立场。<sup>①</sup>此外,对以色列和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激进做法,中国也会予以批评和谴责。但这往往被以色列理解为对巴勒斯坦的倾斜,进

<sup>①</sup> 引自《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1)》, <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211118/1?code=2>。

而对中国的政策主张产生误解。

伊核问题同样也是制约中以关系发展的重要地区因素。以色列与伊朗长期对抗,强烈反对伊核协议。中国则是伊核协议的重要参与者,反对一味制裁或“极限施压”,主张通过多边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同时,在双边关系层面,伊朗是中国在中东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另外,中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于2021年启动了接纳伊朗成为正式成员的程序。中国与伊朗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与伊朗的合作,都使以色列产生了一定的顾虑,这在本质上是受到以色列与伊朗矛盾的影响。<sup>①</sup>

第三,双方的认知差异,特别是以色列内部对华认知的巨大分歧不利于中以关系的发展。

首先,在官方层面,以色列政坛内部对华看法分歧巨大,反映了以色列不同政府部门和政治精英对华认知的分化。总体来看,以色列政府的安全部门和行政部门对华认知差异明显,安全部门多持消极立场,行政部门则相对积极务实。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大多高度重视美以安全合作,在对华政策上对中国持负面认知和消极立场,主张中以关系应服从于美以特殊关系的需要。

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以防务关系中断风波中,部分以色列政客极力强调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和美以特殊关系的不可替代,主张以色列对华关系应以不危及美以关系为底线。<sup>②</sup>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就曾强调不可忽视美国对以色列对华军售的指控,建议美以应“尊重”彼此的安全关切。<sup>③</sup>这一派以色列政客对待中以经济合作也采取了相同立场。以色列现任公共安全部部长奥马尔·巴列夫于2018年向以色列议会提出了正式建立外资审查机构的提案。<sup>④</sup>以色列前安全机构负责人纳达夫·阿加曼也曾在特拉维夫大学的一次非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企业的投资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并呼吁议

① 殷罡《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六十年述评》,《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第34页。

② Yoram Evron, "Israel'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A Dependent State's Dilemma," *Asian Survey*, Vol. 56, No. 2, 2016, p. 397.

③ Moshe Arens, "The Enemy of Our Friend," *Haaretz*, June 21, 2005.

④ Mordechai Chaziza, "Israel Agrees to Monitor Foreign Investment," <https://besacenter.org/israel-monitor-foreign-investment/>.

会通过立法监督外国投资。<sup>①</sup> 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前任负责人埃弗莱姆·哈利维更是直言不讳地警告说,与中国深化关系将使以色列付出“沉重代价”。<sup>②</sup>

相对而言,以色列政府和政治精英更重视中以关系的务实性。曾任以色列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阿维·西蒙和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尔·本一沙巴特等均反对成立针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机构。<sup>③</sup> 以色列现任财长阿维格多·利伯曼曾应邀访华,多次表达对中以合作的支持。

此外,相对中国中东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以色列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和不确定性。<sup>④</sup> 2021年组建的以色列现政府在涉疆问题上摇摆不定。以色列先是加入了由加拿大提出、欧美国家主导的要求派驻所谓“独立观察员”入疆的联合国人权组织提案;<sup>⑤</sup>但在同年10月,以色列又退出了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率领43个国家发表的抹黑中国、干涉内政的涉疆联合声明。由此可见以色列内部尚未形成明确的对华共识。未来两国仍需加强政策沟通,减少不确定性。

其次,在社会层面,中以两国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

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也会对中以关系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相对其他西方国家,尽管以色列很少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sup>⑥</sup>但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属于异质文化,<sup>⑦</sup>双方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导致双方出现思想观念层面的分歧,并影响彼此对对方的认知。

---

① “Chinese Investments in Israel Could Pose Security Threat, Shin Bet Chief Warns,”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business/chinese-investments-in-israel-could-pose-security-threat-shin-bet-chief-warns-1.6827146>.

② “Former Mossad Chief’s Stark Warning About Israel and China,” *Haaretz*,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podcasts/PODCAST-listen-how-china-can-quietly-take-over-israel-according-to-former-mossad-chief-1.10287024>.

③ Sami Peretz, “Israel Won’t Vet Chinese Investment, Risking U. S. Ire,” *Haaretz*, May. 20, 2019.

④ Yoram Evron, “Israel’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A Dependent State’s Dilemma,” *Asian Survey*, Vol. 56, No. 2, 2016, pp. 412 ~ 415; Shira Efron, eds., *The Evolving Israel-China Relationship*,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pp. 126 ~ 127.

⑤ Danny Zaken, “US Pressures Israel on Trade With China,”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10/us-pressures-israel-trade-china>.

⑥ 肖宪《“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106页。

⑦ 崔守军、梁书砚《中以关系的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第62页。

根据皮尤的民意调查,2018年以色列对华评价并不乐观,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仍超过40%。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以色列受访者在涉疆问题等所谓中国“人权问题”上立场更靠近西方国家。<sup>①</sup>然而,不同于欧洲国家对犹太人乃至以色列的负面印象,中国许多民众对犹太商业神话、教育水平和发明创造能力等都存在十分积极的认知。这同以色列成功的对华公共外交有重要的联系。

中以两国社会对彼此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无疑也会影响两国合作关系的提升。鉴于中国很少有对以色列内部对华认知差异和负面认知的了解,加之中国对以色列的公共外交尚有待加强,中国社会对以色列的认知存在着过于乐观的问题。对中以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特别是以色列内政的复杂性缺乏深入认识,也都有待通过加强中以“民心相通”而改进。

#### 四、结 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以色列在很长时期内都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其原因在于双方关系在冷战时期深受冷战体制和中东地区格局及彼此外交政策的影响。伴随冷战的结束、阿以关系和巴以关系缓和,以及中以双方外交政策的调整,双方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的中以关系经历了1992年到2005年磨合期、2005年到2011年的稳步发展期、2011年以来的高速发展期。30年来,中以关系在政治、贸易、投资、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于2017年建立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色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国家,双方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成就斐然。以色列已成为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

当前,中以关系的发展既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也面临一些消极因素的制约。

---

<sup>①</sup> Richard Wike, eds., “International Publics Divided on China”,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8/10/01/international-publics-divided-on-china/#:~:text=Israel%20also%20views%20China%20as%20a%20nation%20that%20civil%20rights,%20In%20Asia%2C%20sentiment%20is%20somewhat%20mixed.>

从积极方面看,两国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存在直接冲突;两国不断加强政策对接,双方合作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经贸合作基础牢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改善;中以关系抗压性明显增强等,都有利于中以关系的发展。

从消极方面看,美国的干扰是中以关系中最重要消极因素。以色列依附于美国的美以特殊关系,导致了以色列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情况下经常以牺牲中以关系来维护美以特殊关系。此外,中在以在中东地区诸多问题上存在的立场分歧以及中在以在不同层面对彼此的认知差异,也对中以关系产生制约作用。

总的来说,在短短的30年内,中以关系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尽管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制约因素,但可以相信,中以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未来双方的合作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al exchanges. However, whethe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an be further deepened depends on whether the differences of perceptions about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mpacts of changing Sino-European relations, other issues of disturbance like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nd the lack of innovation momentum could be properly managed.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a and Switzerland should closely follow the spirit of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and take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as well as field of Sino-Swiss coopera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bilater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n major issues with global concern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epidemic governance, and commit to make Sino-Swiss relations a model of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Keywords:** Sino-Swiss relationship, innovation, innova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strategic analysis

**Authors:** Men Honghua, Chang Jiang Scholar and Dea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itute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He Hailou, Master Student,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Men Honghua and He Hailou**

## 54 China-Israel Relations, Histor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Commemo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Israel-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Abstrac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China and Israel faile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due to the complex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Middle East regional pattern and their own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Cold War. China and Israel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92 at last. Israel was the last Middle East country with which Chin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Bilateral relations of China and Israel has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 stage—adaptive period, steady development period, and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since 1992. The two countrie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partnership” in 2017, with highlights building innovation cooperation platform,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e, education by innovation, and extensive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ooking forward, the history of long-term friendship,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by governments from both sides, strong economic and trade foundation,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 ability to resist pressure, together constitute favorable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Israel relations. Meanwhil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U. S.,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policy and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constitute unfavorable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Israel relations.

However ,the overall positive trend of China-Israel relations will not change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will surely achieve greater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ina , Israel , diplomatic relations ,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partnership

**Authors:** Liu Zhongmin , Professor ,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Wang Lishen , Ph. D. Candidate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Liu Zhongmin and Wang Lishen**

## 76 Sino-Greek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Sino-U. S. Competition: Cognition , Status and Challenges

**Abstract:**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pattern. As a significant partner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n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Europe , Greece constantly tries to maintain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 with the diplomatic orientation of its own interests. Over the years ,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Greece has continued to deepen , and many cooperation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 trade , infrastructure , energy , cultural tourism , etc. At the same time ,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its strategic layout and influence in Greece. The intensified Sino-U. S. competition inevitably bring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o Sino-Greek relations. Within a predictable period of time , Sino-Greek relations will still maintain positive and friendly through pragmatic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

**Keywords:** Sino-Greek relations , Sino-U. S. relations , strategic competition , cooperation

**Authors:** Hu Jingjing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an , Center for Greek Studies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Liu Fan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 Center for Greek Studies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u Jingjing and Liu Fan**

### *Area Studies*

---

## 92 Biden Administration's Iran Policy and the Iran Nuclear Issue

**Abstrac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herited legaci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Iran policy. This determines that althoug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cannot fully continue the extreme pressure exert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ward Iran , it would not be totally abandoned immediately as well. Republicans and some of the

• 157 •